

“草原部落” 黑马文丛·贺雄飞/主编

深呼吸 (下卷)

——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

张建伟 著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目

录

下卷 未公开的新闻内幕

第一章 初次下潜

我的 7000 字的稿件，只剩下了一行！一行——想看，这比枪毙了我的稿件还让我难受！我写了 7000 字，只有一行是符合见报标准的。我还有什么资格当记者！

- 假如我去养鸡 (3)
- 从编辑到记者 (7)
- 第一个“头条” (9)
- 小卒挂帅记 (11)
- 字纸篓里的“垃圾” (14)
- 渴望蓝天 (17)
- 珍惜这种渴望吧 (20)
- 杂感式报道 (21)

□ 无形道道关,才干难施展	(23)
□ 穿越“虚空”的信息流	(25)
□ 玩命地干,拼命地玩	(27)
□ 非驴非马是骡子	(32)
□ 关于新闻时代感的一点体会	(33)
□ 共性·个性·时代精神	(36)
□ 铁肩担道义	(39)

第二章 上帝管两头,我管中间

名记者之所以“名”,不仅在于他天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,比起编辑有更多的了解,更在于他能够经过艰苦的独立思考,对生活中许多人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事情,赋予一种深刻的背景和意义。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我们回味:“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重要新闻,而要努力使新闻重要起来。”

□ 在南下列车上	(43)
□ 怎样成为名记者	(45)
□ 变阻力为推力	(54)
□ 黑色幽默	(57)
□ 爱情的结合点	(60)
□ 崭露头角的“三味真经”	(62)
□ 咬定青山不“放松”	(66)
□ “巨人的肩头”在哪里	(69)
□ 阳光下的阴影	(72)
□ 成才环境的全方位视角	(75)

- 未曾预想到的轰动 (79)
- 一篇(组)好报道从哪里来 (81)
- 这里,是一个突破口 (85)
- 张建伟模式 (89)

第三章 重现“第五代”的十天

我们很快写出了第一稿,李大同说:“不行!”

我面对那“不行”的稿件,继续耕耘。

终于有一天,我听到李大同说:“差不多了。剩下的是我的事了。我要再把它改得天衣无缝。”

我几乎幸福得要栽倒了。

- 操戈圆明园 (91)
- 偶然的机遇 (95)
- 第一天:夜访杜厦 (97)
- 第二天:穿越时空的探视 (98)
- 第三天:飞车入京 (100)
- 地下“苦囚”七日记 (102)
- 瞒天过海 (103)
- 第五代 (105)
- 中国青年报万岁! (120)
- 迎接挑战 (122)
- 第一部新闻作品集 (127)

第四章 MBA 在中国的命运

《命运备忘录》问世的当天早晨,那份《中国青年报》就放到了国务院总理的办公桌上,否则,我们不会

那么快便接到了通知：国家经委等七部委首脑，为MBA问题，要求与《中国青年报》对话。

- 活人死了 (130)
- 魂困大连城 (131)
- 死中求生 (132)
- 命运备忘录 (135)
- 与七部委首脑对话 (150)

第五章 深度报道的诞生

1985年12月，深冬季节，中国青年报深厚的土壤里，播下了一粒新种子，后来，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深度报道。春华秋实，十度寒暑，如今，它已经根深叶茂，中国新闻界普遍承认，中国青年报是深度报道的诞生地，同时，一个更为重要的评价是：深度报道，是中国青年报复刊以来最辉煌的成就之一，也是中国新闻界在新的历史时期最值得记忆的成果。

- 举国深呼吸 (152)
- “保胎”记 (162)
- 从宣传到报道 (165)
- 我们是记者，我们写新闻 (170)
- 深度报道浅谈 (178)
- 深度报道的诞生 (186)

第六章 面对太阳大写意

说来奇怪，越出现在挑战面前，我应战的能力似乎

便越强。从总编辑作出决定的当天晚上开始,我连续采写出6篇“主旋律报道”。后来有人告诉我:从我推出头几篇报道开始,参加两会报道的记者中间,便刮起了“张建伟旋风”。

- 1989~1991:故纸堆中 (187)
- 春天的主旋律..... (188)
- 两会:高层公关行动 (191)
- 广东情结:两会“磁力效应” (193)
- 尺子? 尺子……尺子! (196)
- 拿来? 拿来……拿来! (199)
- “跟着张建伟!” (202)
- 张建伟:面对太阳大写意 (203)
- 关于会议深度报道致王晓辉的一封信 (208)

第七章 探视农民帝国

报道发表后的第三天,我刚从北京回到天津,禹作敏的电话忽然打到我家里。

“你能再来一趟吗?”

“怎么啦?”

“大邱庄让武警给包围了。”

我大吃一惊。“怎么回事?”

“你来了就知道了。”禹作敏说,“顺便问一句,你是不是上面派到大邱庄卧底的?”

- 云里雾里大邱庄 (214)
- 奔驰 600:大邱庄图腾 (221)

□ 反弹琵琶不走调·····	(225)
□ 经济政治学·····	(229)
□ 钱围着人转,人围着钱转·····	(233)
□ 人才归之如流水·····	(238)
□ 新潮着,同时也传统着·····	(242)
□ 这一个农民不是那一个农民·····	(247)
□ 再访大邱庄·····	(250)
□ 瞧,那个农民的办公室·····	(252)
□ 农民帝国的覆亡·····	(255)

第八章 第三次解放

还是没有轰动,还是甚至没有读者理睬。

我觉得,对这样的结果,最伤心的就是我。从开始设计到最后完成,投入心力最多的是我,因此最期待它成功的也是我(尽管在采访时,我去的地方不如其他记者去的地方艰苦)。我对比着我执笔策划的《报道方案》,心里在呼喊:“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出错啦!”

□ 再向深度报道挑战·····	(260)
□ 艰难的采写·····	(263)
□ 烧出来的“一个农民”·····	(266)
□ 第三次解放·····	(267)
□ 总算有了点声音·····	(286)
□ 你到底要什么?·····	(291)
□ 高级记者与范长江新闻奖·····	(298)

第九章 思想的季节

那真是一个思想的季节。整个中国新闻界被新思想的光辉笼罩着,不仅我一个,一大批记者写出了一大批有思想深度的报道。《红色的警告》、《鲁布革冲击》以及政论式报道《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》等等。当我们今天要跨越这段历史的时候,我们不得不想一想,在那个思想的年代里,那些记者是如何看待“思想”和“事实”的关系的。

□“冰点”打劫一块“冰”	(301)
□原告:怎样?到底怎样?	(303)
□被告:默认?还是回应?	(308)
□一个编辑的说法	(310)
□心事浩茫	(339)
□思想的季节	(341)
□大辩论没带来大变化	(370)
后 记	(372)
附录 张建伟部分新闻报道目录	(374)

下 卷

未公开的新闻内幕

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一位记者写出的一部独一无二的书。

——主编手记

我当然希望正在学新闻和正在搞新闻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，并以此为基础，展开对“张建伟及其报道”的批评。它确是“独一无二”的，或能成为新闻讲坛上的一个话题，报业同行超越“张建伟及其报道”的一块垫脚石，普通读者对“新闻内幕”感兴趣的一系列故事。

——作者手记

第一章 初次下潜

我的7000字的稿件，只剩下了一行！一行——想想看，这比枪毙了我的稿件还让我难受！我写了7000字，只有一行是符合见报标准的。我还有什么资格当记者！

假如我去养鸡

见异思迁是俗人们的天性，为圣贤所不齿。古希腊时，一位青年一心成圣，师尊德谟克利特，追求不朽功业。一天，师生二人和一头猪同船旅游，荡舟海上，忽遇狂风，只见明浪暗涌，将小船撕撕扯扯，往漩涡里拖。学生大惊失色，面若死灰，拉住老师颤声道：“我们就要死了吗？”老师沉声反诘：“尔不想成圣贤耶？”学生道：“天欲我亡，圣贤何益？”老师不禁长叹一声，执学生手而至船尾，见那头猪正埋首沉睡，虽狂风巨浪而本性不移，超然如初。老师于是现场授学曰：“方此乃圣贤之态也！处变而不惊，见异而不迁，汝能持否？”学生顿悟：“惭愧，吾不如猪也！”盘坐于猪侧，见贤思齐……

古希腊的圣贤榜样使我亦感惭愧。15年前，1983年，我也有一次见异思迁的经历。其时，我已大学毕业，跻身中国青年报社，日夜笔耕如喘牛，除赢了个衣带渐宽，将近两年时光，一无所成，虽整日在京都厮混，却大有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感慨。只是周日，我才有些许的活气，因为我知道，今天又可以随着二叔去大吃一顿了。二叔正正经经是一个农民，虽说不过是个养鸡人，但已俨然私营企业的规模，无京都户口，却有钱常住。每到周日，他便唤我出来，到

北京的八大楼以及新开辟的著名饭庄去做口腔的巡礼，不过一年光景，已吃得没了生疏的场所。

我记得真切，那天我们坐进了萃华楼，点了一盘油焖大虾，一盘芙蓉鲜贝，一盘香酥鸡腿和一碗漂着一只王八的汤。我闷头吃，二叔却很少动筷，只一味地喝酒。每当我劝他吃，他便说，“你吃；你吃，我不爱吃那东西。”然后再讲一段他几十年经历中的一节或一段人生哲理。例如，他说，在他穷困潦倒时节，举凡救助过他的人，哪怕一水一饭，他都不忘记，一有机会，便将大把的票子送去。又如，他说穷的时候，有孝心也难以行孝，后来有了钱，便补偿。奶奶年事已高时，记忆已经不行，仍爱赌牌，每当此时，二叔便揣着一沓票子，伺候在奶奶身后。奶奶总是输，每次输时，便回头对她的二儿子歉意地一笑，说，“又输了……”二叔便赶忙说：“不碍，不碍，接着打，接着打。”同时把钱递上去。奶奶去世时，正值盛夏。乡下的风俗，停灵日久，方显大家族的气派。但乡下无冰，尸体欲腐，二叔便命人将县城冰厂制做的冰棍包了3天，日日冰着奶奶的尸身，直至下葬。他讲这些事情时，虽不动声色，却听得出透着自豪。

那天的几份大菜，我连一半也未吃完，二叔便买一个大食品袋，命我装走，说，“饭菜是不能浪费的。我讨厌浪费。”于是，那天的晚饭，我便邀同宿舍的二位好友一同吃萃华楼的剩菜，好友们大喜，居然辅之以酒，一醉方休。杯盏狼藉，自然不及收拾。不料，居然因此出了大事，险些促成我一次人生的转折。

第二天，一位报社领导巡视宿舍，发现了我房中的“风景”，并未置一词。但几天后，有口风传入，说，“像这样的大学毕业生，整天花天酒地，有什么资格做报社记者！”想我一个出世不久的穷学生，领导居然对我如此看法，还有活路吗？于是思前想后，决定另谋出路。而且，有二叔的榜样，想我若经商，也一定有个人样。于是一过周日，我便直扑二叔下榻处，劈头就说：“我想跟你一起干啦！”并讲了原委。二叔沉吟良久，“今天不下馆子啦，弄几瓶水果

罐头吃。”“怎么啦？”“不怎么，吃腻了！”便找来两把叉子，叉一块水果，喝一口酒，闷了好长时间。我不知他的态度，心中生出急躁。忽然，我见二叔咧开了嘴巴，将手伸进去，如是者再，那嘴便成了一个窟窿，而手中多了两排假牙。

这时，二叔说话了：“你看到了吧？”

“怎么搞的？”

“让人打的！”

“哪？”

“在监狱里。”

“你进过监狱？”

“不止一次。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那年头，为了有口饭，我沿街卖布头，只要被抓着，就会进去……我是死过几回的人啦！”

我不禁默然。这时，二叔把假牙用水洗一洗，又装进嘴里。

“算起来，就为了糊口，我在狱中的时间和自由的时间一样多。”

他缓缓地讲着，早已没了愤怒和不平，“原先，像你一样，我也有个北京的户口，有个好职业，但一进监狱，这一切全给吊销了。几年前，我被平反，这一切又都给了我。收到户口和职业证件的那天，我放声大哭，然后，把这梦寐以求十几年而复归的东西撕了个粉碎！它们补偿不了我！它们安慰不了我！我他妈的还经商，还办厂，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！我他妈的成功了！可是……”

他突然拿眼盯视着我，“你也要干这种下三滥的行当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我已经答不上来。我热泪涟涟。

二叔却接着说，“是下三滥的行当！你别干这个，你缺钱花，来找我要。你是我们张家祖祖辈辈才养成的头一个秀才，到今几个也是唯一的一个。祖宗等着你辉煌辉煌呢，何必跟我走？！”

言毕，二叔不再多讲，满面凄然之色，我也只剩点头的力量，说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再也不见异思迁了”，但心中想的是，“你他妈的吓死我啦！看来，见异思迁也须有誓不为人的资格，例如进过监狱。否则，还是老老实实过我的紧日子吧！”

15年后，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社会学家陆建华有过一次对话，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《冰点》专版上。在对话的开头，我引了北岛的一首诗：

我在雾海中航行，没有帆；
我在月夜下停泊，没有锚；
路在这里消失，夜在这里消失。

其实这正是我15年前之心境的写照。然后我假托一个“姓邢的朋友”，讲了一段事情，而那个“姓邢的朋友”，其实正是15年前的我。那件事情是这样写的：

我有一个姓邢的朋友，25岁那年，有一天，他一瞅日历，正是自己的生日，一想自己仍然一事无成，不禁悲从衷来。于是下决心：一定干出个名堂来。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是坚定的，还搞了个仪式：制作了卡片，把自己的生辰年月写上，把自己的“败绩”写上，还贴上张照片，然后就到河边去了。他后来对我说，他走到河边的时候，正是夕阳西下时分，晚霞似火，看上去和他的心情一样，十分悲壮。他把自己做的卡片撕碎了，朝河水里一洒，纷纷扬扬地漂在河面上，然后就跪下了，准备发誓。忽然一想，不行，不能两条腿都跪下，只能跪一条腿，表示向过去告别，另一条腿要挺着，表示向未来进军。就这样立了誓，又去奔波自己的前程去了。

说起来,这确实是我经历中的一段重要插曲。我虽然没有跟我叔叔去养鸡,但确也决定“树挪死,人挪活”了。我的家乡在天津,我找了一位报社领导,要求到天津当驻站记者,居然获得同意。于是我的身份就变成了“中国青年报驻天津记者站记者”,一干就是10年。

直到今天,还有人这样向报社的领导发问:“假如张建伟不离开北京总社的环境,那么,中国青年报还会有以后的‘张建伟’吗?”这问题其实暗含着两个答案:假如张建伟不离开总社的环境,那么他便没有可能成为以后的名记者;既然是这样,那么,总社的青年记者和青年编辑的成长环境便也值得检讨。

但我从来不认为这个答案有这样简单。我后来的经历,有多种因缘促成,不是一句话可以应答的。

从编辑到记者

总之,1984年,我确实成为驻天津的记者了。少年壮志,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的,也很想干出点名堂来。那时,我已经有了5年的新闻从业经验,3年记者(上大学前,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当《青年节目》组的记者)两年编辑,上过大学,又是新闻专业,觉得自己写稿是什么问题也不会有,肯定写一篇上一篇,还都是优秀的报道。

但头一篇报道就险些把我打懵了。

我回到天津的时候是3月,众所周知,那年头,3月,是“文明礼貌月”,记者们肯定要写关于文明礼貌方面的报道。我深入采访,到商业企业和公交战线,记得光是跟车——跟着公共汽车采访,就花了我整整3天时间。最后,我激动万分地写了一篇7000字左右的稿件,寄发给报社,然后就等着“中彩”了。此后我每天都认真地读我们的报纸,看我的报道发了没有。当然,主要是看头版

头条。这么“伟大的”报道，不发在头条，也会发在报眼上吧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眼瞅着“文明礼貌月”就要消失了，但我的报道还是没有踪影。一个新记者，他是很没有勇气拿起电话，问“我的稿件发了没有”的，他们一般都怕编辑。我当时就是如此。但我实在急了，还是拿起了电话。我得到这样的回答：你的稿件早就发了，在某某天。我大为惭愧，自己没发现，还怨编辑没给你发，什么东西！于是找出那天的报纸，找呀找，就是没有我的那篇报道。我冒汗了。见鬼了！再找，这一次，从一版到二版，一行行地用尺比着找。终于找到了。编辑没有骗我。绝对地发表了，见报了。但，我的7000字的稿件，只剩下了一行！一行——想想看，这比枪毙了我的稿件还让我难受！我写了7000字，只有一行是符合见报标准的。我还有什么资格当记者！

今天，我叙述这件往事，是想说明，当一个新记者最初上路的时候，往往都会遇到两个似乎很小、却可能会影响你一生的问题：

- 1、编辑如何对待记者的稿件，对记者的影响有多大。
- 2、记者一般都认为自己的稿件是“合格品”甚至“优质品”。

记者和编辑天然就是一对矛盾，而矛盾一般都是从这里产生的。

仅从记者这方面来说，如果他的稿件，长期地在编辑部受到这样的“待遇”，那么，他的自信心将受到严重的打击。没有编辑告诉他“应该”怎么样，稿件的不足处在哪里，长此以往，记者会“越来越不会写稿”——那种编辑部希望看到的稿件。

我是幸运的。后来，我的稿件再也没有受到这样的“待遇”，相反，有好几件事情发生了，不仅使我从此更认真地工作，而且产生了对一个报社的“报恩”思想。

第一个“头条”

那个“7000字变为一行文字”事件确实打懵了我，但我没有被打倒。几天后，我怀着一腔热血，再次采访了一个人物。

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，报道先进青年是记者的使命之一。那时，我们还没有对所谓“先进人物”的报道，有过后来的怀疑和反思。所谓先进人物的报道，一定要写成“典型报道”，是前辈记者教给我们的、而我们当时决不怀疑的先验性经验。

当时，共青团天津市委评选出“十大红旗青年”，我采访的人物是其中的“一面红旗”。记得采访地点很远，我骑着自行车，顶着早春的风沙，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到被采访者所在的工地，同他本人和他的同事们交谈，观察现场，被他的事迹本能地激动着，然后写出了报道。

这一次，我写的报道有4000多字，名《风展红旗如画》。我不敢奢望它有比第一篇报道更好的命运。但我还是期待着它能见报。

真幸运！这一次，报道不仅见报了，而且上了头条，配发了评论。但欣喜之余，引起我深刻的反思。

见报的稿件同我写的稿件有多大的不同呀！我起码写了4000多字，见报稿给删成不到两千字。这是我到中国青年报以来的第一个头条。我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。我像读《圣经》一样读发表的稿件，并对照着我的原稿。但我所激动的不仅仅是把一篇“大而不当”（看我原稿的标题就能看出来）的稿件改成了主题鲜明、行文流畅的稿件，更主要的是编辑的责任心和提携后进的情怀。我不知道是谁编辑的我的稿件，但很快我接到了张飙的来信。

应该介绍一下张飙。他现在是《科技日报》的总编辑。但在1984年，他是从四川调到总社的，担任本报经济部主任。后来，他